

## [Special Contributions]

# Is It Necessary for School to Walk?: An Interview with Mr. Zou Lei

<sup>1</sup>WANG Zuyou    <sup>2</sup>ZOU Lei

<sup>1</sup>Taizhou University, China

<sup>2</sup>China Writers Association, China

Received: January 10, 2026

Accepted: February 15, 2026

Published: March 31, 2026

**To cite this article:** WANG Zuyou & ZOU Lei. (2026). Is It Necessary for School to Walk?: An Interview with Mr. Zou Lei. *Asia-Pacific Journa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6(1), 001–008, DOI: 10.53789/j.1653–0465.2026.0601.001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s://doi.org/10.53789/j.1653–0465.2026.0601.001>

**Abstract:** In an interview with the writer, Zou Lei, we learned that the core inspiration of *The Walking School* for children's literature creation lies in the fact that truly outstanding children's literature should embody the unity of historical depth, intellectual profundity, and artistic excellence. It should be rooted in the soil of national history while transcending the constraints of specific time and space to engage in spiritual dialogue with children across different eras. It belongs both to children and to all of humanity; it is both literary and educational. Every outstanding children's book is a seed, and *The Walking School* is precisely such a vibrant seed. Its literary value and inspirational significance will only grow more evident with time.

**Keywords:** Zou Lei; *The Walking School*; children's literature

**Notes on the contributors:** WANG Zuyou is a professor who graduated from Xiamen University in 2006 under the guidance of Professor Yang Renjing. He completed a one-year visiting scholar program at Chatham University and the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His primary research areas include American literature and literary translation. His e-mail is wangzuyou2012@163.com. Known as a first-class literary creator, a writer, and a member of the Chinese Writers Association, ZOU Lei is vice president of the Jiangsu Reportage Literature Association, president of the Nanjing Government Writers Association, vice president of the Jiangbei New Area Federation of Literary and Art Circles, and president of the Jiangbei New Area Writers Association.

# 學校需要行走嗎？

## ——作家鄒雷訪談錄

<sup>1</sup>王祖友；<sup>2</sup>鄒雷

<sup>1</sup>泰州學院；<sup>2</sup>中國作家協會

**摘要：**在對作家鄒雷訪談中，我們得知《行走的學校》對兒童文學創作的核心啟示在於：真正優秀的兒童文學應當具備歷史厚度、思想深度和藝術高度的統一；它既能夠紮根於民族歷史的土壤，又能夠超越具體時空限制，與不同時代的兒童進行精神對話；它既是兒童的，也是全人類的；既是文學的，也是教育的。每一本優秀的童書，都是一顆種子，《行走的學校》正是這樣一顆充滿生命力的種子，它的文學價值和啟示意義，將隨著時間推移而愈發彰顯。

**關鍵詞：**鄒雷；《行走的學校》；兒童文學

王祖友：鄒先生，您好！說起兒童文學，不得不說到您的《行走的學校》。這部小說以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時期的新安旅行團為背景，通過少年童牧、章棗、丁捷等人物在 17 年革命歷程中輾轉 22 省、行程五萬裏的成長故事，當時是如何『遇見』這個史料的呢？

鄒雷：大約在 2019 年秋天，我在為江蘇鳳凰少年兒童出版社寫一部《盧志英中隊》的兒童報告文學作品，講述的是南京雨花臺小學丁芝秀老師的育人故事。他們班調皮搗蛋的孩子太多，第一節課就給剛調來的年輕丁老師一個下馬威。後來，丁老師發現班裏圖書角有一本盧大榮寫的書，叫《我與爸爸一起坐牢的日子》，因為他們班上有的孩子不好好上學，經常會偷偷跑到夫子廟去聽書，於是她就給孩子們讀盧大榮寫的書。她發現孩子們被書中的英雄盧志英的故事吸引，於是她讓孩子們去雨花臺找盧志英烈士墓，並組織孩子們給英雄掃墓，用英雄的事蹟來教育孩子，引導他們走上正確的人生道路。1955 年，成立了全國第一個英雄中隊——盧志英中隊。別看他們還都是小孩子，中央號召全國人民支援農業建設，丁老師跟孩子們討論，中隊該有什麼樣的行動？少先隊員覺得自己太小，做不成什麼事。在丁老師的引導下，孩子們決定給蘇北地區建一座水庫。他們通過種南瓜、撿廢品賣錢，可是這只能算是杯水車薪，無法解決修水庫巨筆費用問題。丁老師與孩子們商量，給團省委寫了一封信，倡議全省少先隊員一起募捐，結果時間不長就募集了 7 萬多元人民幣，真的在連雲港抗日山下建成了『紅領巾』水庫。這本書寫出來後，編輯也被書中精彩的故事吸引了。副總編陳文瑛提出了出一套『英雄中隊』書的想法。後來確定增加的其中一本書就是『新安旅行團』中隊。寫作中閱讀了大量的史料，覺得光寫一部報告文學還不過癮，於是又寫了《行走的學校》這本兒童文學，由希望出版社出版。

王祖友：《行走的學校》是如何展現革命年代少年兒童的愛國精神的？您的人物塑造有沒有拔高之嫌？

鄒雷：《行走的學校》是一部以『新安旅行團』真實歷史為背景的長篇小說，我主要通過以下幾個方面，從多個維度展現了少年兒童的愛國精神：

一是以文藝為武器，投身抗日救亡。新安旅行團的少年們，平均年齡僅十多歲，他們以文藝為武器，通過放電影、演講、演話劇、辦壁報、寫標語、教唱抗日歌曲等方式，深入城鄉喚醒民眾抗日意識。書中特別強調他們主動選擇偏遠農村和底層民眾作為宣傳對象，如為不識字的農民表演戲劇，在牧區放映抗日電影，將救國理念轉化為通俗易懂的藝術形式。他們通過銷售進步報刊、街頭演出募捐、放電影收費等方式籌集經

費,這種自給自足的模式,體現了少年們將個人能力與國家命運緊密結合的擔當。

二是不畏艱險的堅韌品格與樂觀精神。新安旅行團的孩子們在艱苦條件下,展現了超人的意志力。團員們僅靠雨傘、草鞋、小背包三件行囊,17年間徒步5萬裏,足跡遍及22個省市。書中描寫他們常面臨饑餓、疾病、國民黨當局阻撓甚至轟炸威脅,但他們始終以『小好漢』自居,用樂觀精神化解困境。這個團體裏誕生了集體互助的成長模式。他們實行『小先生制』和民主生活會,年長團員教年幼團員識字算術,輪流擔任活動主席,通過民主討論決策行動方案。這種模式培養了團結協作、責任共擔的集體主義精神,成為支撐他們長期鬥爭的內在力量。

三是教育實踐與愛國情懷的深度融合。他們踐行陶行知教育思想,秉承『生活即教育,社會即學校』理念,將課堂延伸到抗戰一線。少年們在街頭演講中鍛煉口才,在編寫抗日劇本時學習文史,在行軍路線時掌握地理知識,真正實現『教、學、做合一』。這種教育方式使愛國情懷從理論轉化為實踐能力。他們從自發到自覺的革命覺醒,初始行動源於樸素的救國熱情,隨著深入社會,逐漸認識到只有共產黨才能救中國。例如通過接觸地下黨員,接受黨的領導,參與組織鹽阜區少年兒童代表大會,並制定《少年先鋒隊隊章》,將個人成長納入黨的革命事業中。

四是人物塑造嘗試平凡少年的英雄化書寫。通過鮮活的人物群像,避免概念化說教。如,繪畫天才童牧用漫畫揭露日軍暴行,將藝術才能轉化為戰鬥武器;音樂少年章棗創作抗日歌曲,以歌聲凝聚民心;孤丁捷兒從怯懦到堅定的轉變,象徵苦難中的民族覺醒。這些角色既有孩童的天真淘氣,又有超越年齡的成熟,讓當代小讀者產生情感共鳴,理解『愛國』並非抽象概念,而是具體行動。

《行走的學校》通過紀實與虛構的巧妙融合,將新安旅行團塑造為革命年代少年兒童的愛國精神符號。他們以『行走』打破課堂邊界,以『文藝』點燃救亡火種,以『集體』鍛造革命信念。其精神內核是個人成長與國家命運的同構性,對當代青少年樹立『躬行實踐、胸懷家國』的價值觀仍具深刻啟示。

我一貫反對拔高人物,不管什麼類型的文學作品,真實才會有生命力。在塑造《行走的學校》主要人物時,我讓他們每個人身上既有優點,也有缺點。比如丁捷不會當『小先生』,於是去向章棗討教,章棗提了額外要求——要他給自己弄兩個烤山芋作為報酬。丁捷沒有辦法,只好晚上去老鄉家的地窖裏去偷山芋。結果被人家逮了個正著,兩個人都受到嚴厲的批評,還在生活會上作了深刻的檢討。文本中這樣的故事還有很多,讓讀者看起來更加真實可信。

**王祖友:**這部小說的史料都是有記錄的吧?您在創作過程中遇到哪些難題?

**鄒雷:**是的。新安旅行團的史料比較多,而且有些團員還健在,他們的後人也非常重視父輩的形象維護,尤其是真實性方面。我給《行走的學校》定位是一部紀實小說,因為閱讀了大量的史料,很容易囿於那些材料之中,寫出來的第一稿,基本上就是對史實的綜合,人物眾多,偏重紀實,少有文學,讀起來非常寡淡,我自己都不滿意。問題出在哪裡?我該怎麼辦?經過一段時間思考,我決定將作品中主要人物由過去的7位,減少至3位,同時增加一個虛構的人物——『小盆友』,也就是丁捷。這樣做最大的好處是,將故事集中到2個人身上,塑造人物更加容易,劉紀宇、童牧、章棗的形象更加鮮明,丁捷是我根據其他人的故事綜合出來的人物,也是我要著重創作的人物,他由弱變強的成長,是新安旅行團團員集體形象的化身。為了保持紀實的風格,我遵循『大事不虛,小事不拘』的原則,所以故事和人物都顯得十分真實,而可讀性又超出了一般文學作品。後來才有了評論家『鄒雷把新安旅行團的史實掰開來,嚼碎了,然後化作《行走的學校》』之說。

**王祖友:**您在書的開頭就提到陶行知的《自立歌》(滴自己的汗,吃自己的飯),這與革命年代少年兒童的成長的關係是?這在物質生活極大豐富的當代社會,還有什麼關聯性?

**鄒雷:**這所學校是陶行知辦的,一直奉行他的理念,這個叫新安旅行團的學生團體,一直宣傳抗日,並在途中接受了共產黨的領導。其實對現當代教育都有借鑒意義,對於當代少年兒童來說,讀這部作品,無異於

一次精神洗禮,至少可以感悟到三種精神:一是家國情懷。新安旅行團的成員把個人的命運與國家的前途緊密相連,在中華民族生死存亡的緊要關頭挺身而出,盡其所能宣傳抗戰,本身就是在為抗日救國做貢獻;二是不畏艱難困苦的樂觀主義精神。新安旅行團沒有經費,孩子們一直處於缺衣少食、居無定所的狀態。但他們心中有方向、有目標、有夢想,始終沸騰著一腔熱血,澎湃著一種激情,以精神上的富足消弭了物質上的貧困,整個作品自始至終洋溢著一種樂觀向上的精神品質;三是團結互助的集體主義精神。新安旅行團的少年們走出校門,融入廣闊的社會生活之中,在極端困難的情況下,旅行團這個小集體就是每個人的依靠。在沒有固定校舍,也沒有專業教師的情況下,他們實行『小先生制』和民主生活會,自我教育,自我管理,大家團結一心,互相幫扶,每個人都能得到生活上的照顧和精神上的成長。

借用中國陶行知研究會會長朱永新的話來說,『我相信,新安旅行團的故事必將給予少年兒童情感上的感動、思想上的引領和精神上的激勵,使他們從激情燃燒的革命歲月中汲取養分,助力少年兒童的精神建構和人格塑造,激勵年輕一代繼承紅色傳統,邁向更寬更遠更光明的如歌征程』。

王祖友:1935年,正值抗日戰爭時期,是中華民族面臨生死存亡的緊要關頭,教育家陶行知先生站在時代潮頭,以獨有的遠見卓識,提出了『生活即教育,社會即學校』的新型教育理念。我看到書結尾,您描寫章棗用筷子作指揮棒,指揮大家唱《新安旅行團團歌》,其中再次提到『生活即教育,社會即學校』,我覺得您這是呼應開頭和點題,再次強調陶行知教育思想的偉大力量。這是不是您的作者意圖?

鄒雷:陶行知的『生活即教育,社會即學校』理論雛形,形成於1929年冬的演講,1930年3月通過《鄉村教師》正式公開發表。這一主張是對當時脫離實際的傳統教育與杜威理論本土化的反思,旨在推動教育服務於人民大眾與社會改造,其影響延續至今,成為中國特色教育理論的重要基石。新安小學是陶行知在淮安舉辦的一個鄉村小學,執行的就是『生活即教育,社會即學校』『教、學、做合一』原則,生活需要什麼,他們就學什麼。比如他們生活在淮安水鄉,不會游泳是不行的。於是學校請漁民教孩子們學游泳,漁民的教學方式也很特別,將坐在船幫上的孩子們用竹竿撥下水,任由他們在水裏撲騰,當看到某個孩子要沉下去的時候,他才伸出竹竿將他撈上來。不要一周時間,孩子們個個都學會了游泳。這就是所謂『生活即教育』的具體實踐。而這種實踐是十分重要的,後來新安旅行團的孩子們到了蘇北根據地,在一次日軍大『掃蕩』中,他們與敵人遭遇,他們是跟隨『魯藝』學員們一起突圍,前面遇到了一條奔騰的大河,新安旅行團的孩子跳入水中,奮力遊過了大河,而那些學員年齡還比他們大,可是不會游泳,最後都犧牲在河邊。

新安旅行團踐行『生活即教育,社會即學校』理念是一貫的。他們最初從淮安出發,到鎮江,然後在南京賣報刊雜誌換來生活費用,後來到安徽巢縣宣傳抗日,打算等天暖和後再北上。這時校長方達之瞭解到田漢先生在南京排演話劇,於是請他為新安旅行團寫團歌。田漢被新安旅行團孩子們的精神感動,爽快地答應了下來。1936年4月,田漢的詞寫好了,開頭就是『同學們,別忘了,我們的口號:生活即教育,社會即學校……』歌詞中『生活即教育,社會即學校』源自陶行知的教育思想,強調在實踐中學習、服務社會。歌詞中『別笑我們年紀小,我們要把中國來改造』,展現了少年兒童以文藝為武器,投身抗日救亡的堅定信念和革命理想。作曲家張曙於同年6月22日完成譜曲。《新安旅行團團歌》成為新旅宣傳抗日的核心武器,每次演出均以團歌開場,以《義勇軍進行曲》結束。書的結束,章棗用筷子作指揮棒,指揮大家唱《新安旅行團團歌》,是呼應開頭和點題,再次強調陶行知教育思想的偉大力量。這是在創作中一直貫穿的一條主線。

王祖友:我看到『用精神的亢奮,對付折磨人的饑餓』(77頁)這句話時,擔心這有點與時代脫節。您是怎麼想的?

鄒雷:我以前不太瞭解教育,寫了這本書瞭解了陶行知,瞭解新安旅行團,那個年代,不是這個年代。我現在正在寫一部教育內卷的小說,我感覺教育已經偏離了軌道。

王祖友:教育的正確軌道是什麼?教育救國的理念您相信嗎?

鄒雷：關於『正確軌道』，我無法直接給定義式答案。從陶行知的『教學做合一』到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四個學會』，核心矛盾始終是個人發展與社會需求的平衡。需要強調教育不是流水線，最近教育部推進的『素養導向課程改革』正是對工業化教育模式的修正。

教育的本質應是點亮心靈的火炬，而非製造標準化零件的模具。在功利主義與技術理性的浪潮衝擊下，教育逐漸偏離核心軌道，唯有回歸『以人為本的全面發展』，才能找到正確的方向。

人性化是教育的靈魂底色。孔子早在千年前便提出『因材施教』，尊重每個學生的獨特性；馬克思宣導『人的自由發展』，拒絕將教育異化為工具。反觀當下，應試教育以分數為單一尺規，將學生禁錮在題海戰術中，創造力與想像力被無情扼殺，造就了一批批『空心人』。改變這一現狀，需要推行素質教育評價體系，關注學生的品德修養、創新能力與實踐能力，讓教育真正成為塑造完整人格的過程。

教育亦需紮根現實土壤，踐行社會化理念。陶行知『生活即教育』的箴言，在新安旅行團的實踐中得到生動詮釋。如今，我們更應打破教育與生活的壁壘，讓學生在真實的社會場景中學習，培養其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與社會責任感。

教育還應突破時空限制，走向終身化。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德洛爾報告》指出，學習應貫穿人的一生。在知識更新日新月異的時代，構建全民終身學習體系至關重要。然而，技術異化帶來的演算法馴化思維，正在侵蝕人們獨立思考的能力，這就需要加強人文與批判性思維教育，讓人們在終身學習中保持思想的敏銳與深度。同時，面對城鄉教育資源斷層的鴻溝，數位化教育普惠工程如中國『慕課西部行』，正以科技之力縮小差距，讓優質教育資源惠及更多人。

教育的正確道路，是人性化、社會化與終身化的有機融合。唯有堅守以人為本的全面發展，我們才能培養出既有扎實學識，又有創新精神與社會擔當的時代新人，讓教育真正成為推動個人成長與社會進步的不竭動力。

『教育救國』問題要放在歷史語境裏看。嚴復當年翻譯《天演論》就是典型的教育救國實踐，但 20 世紀 30 年代新安旅行團邊流浪邊宣傳抗日時，單靠教育顯然救不了急迫的亡國危機。在近代中國，『教育救國』理念化作諸多先驅者的實踐行動。張謇創辦南通師範學堂，以教育為搖籃，培育出一批批實業救國人才，試圖通過教育與實業的結合，為積貧積弱的中國探尋出路；晏陽初發起的『平民教育運動』，深入民間，致力於提升民眾識字率與公民意識，為啟迪民智貢獻力量；新安旅行團更是將教育救國理念付諸行動，以兒童教育為載體，喚醒民族意識，在戰火紛飛中傳遞希望。然而，在軍閥混戰與殖民壓迫的殘酷現實下，這些努力雖閃耀著理想的光芒，卻難以突破制度性壓迫的桎梏。

步入當代，對『教育救國』的思考愈發深入。教育是『慢救國』，德國在二戰後，通過持之以恆的公民教育重塑價值觀，歷經數十年才初見成效；教育的成功離不開制度協同，芬蘭教育的卓越成就，得益於其高福利的社會公平制度，為教師專注育人提供堅實保障；同時，我們也需警惕教育窄化的風險，若將教育簡單等同於技能培訓，如片面追求『製造大國工匠』，則可能在不經意間弱化公民精神的培育。

『教育救國』的內涵在時代的變遷中不斷延展。在戰亂年代，教育成為『保種』的關鍵手段，西南聯大在艱難困苦中保存學術火種，為國家和民族保留了文化根基；在和平時期，教育則肩負起『塑魂』的重任，以色列通過大屠殺教育凝聚民族認同，中國『兩彈一星』元勳們受益於民國科學教育的積澱，為國家的科技發展奠定基礎。從更宏大的人類文明維度來看，真正的教育救國，其終極目標在於培育『人類命運共同體』意識。竺可楨在浙大推行通識教育時強調『大學教育不在造就專家，而在培養完人』，這一理念至今仍具啟示意義。在當今面臨氣候變化等全球危機的背景下，教育更應打破國家中心主義的局限，培養具有全球視野的行星公民。

『教育救國』的本質是『以教興邦』。我們應堅信教育的價值，它是唯一能同時更新個體生命與社會基因

的強大力量；同時，也要審慎對待『教育萬能論』，明白教育必須與政治改革、經濟轉型、文化重建協同並進。正如新安旅行團在戰火中高唱『我們要把中國來改造』，教育的最高使命，在於喚醒人們對美好社會的想像力與實踐勇氣。歷史已然證明，每一次文明的躍升，都始於教育點燃的星星之火，在歲月的長河中不斷蔓延，照亮人類前行的道路。

王祖友：當代中國兒童文學創作的現狀如何？

鄒雷：在當代中國，兒童文學創作呈現出多元且蓬勃發展的態勢，展現出新時代的獨特風貌。

從主題與題材維度看，當下兒童文學創作呈現出百花齊放的格局。一方面，對革命歷史題材的挖掘持續深入，眾多作家投身其中，為孩子們講述那段波瀾壯闊的歲月。例如，在紀念紅軍長征勝利 80 周年、新中國成立 70 周年、建黨 100 周年等重要節點，大量相關主題作品集中湧現。徐貴祥的《琴聲飛過曠野》、柳建偉的《永遠追隨》、張品成的《我的軍團我的兵》等作品，聚焦紅軍長征，以兒童視角切入，生動再現了長征途中的艱辛與偉大，讓小讀者深刻感受到那段紅色歷史的厚重。而曹文軒的《火印》、黃蓓佳的《野蜂飛舞》等作品，則圍繞抗日戰爭題材，展現了普通中國人在戰火中的家國情懷，引導孩子們銘記歷史，傳承民族精神。這些作品不僅豐富了兒童文學的題材庫，更以藝術化的手法，將紅色基因深深植入孩子們的心中。

另一方面，對現實生活的關注成為創作熱點。作家們敏銳捕捉時代脈搏，將目光投向校園、家庭以及社會各個角落，描繪孩子們的成長煩惱與歡樂。諸如校園霸凌、親子關係、留守兒童等現實問題，都在作品中得到呈現。像殷健靈關注女孩成長的小說《阿蓮》，細膩刻畫了女孩在成長過程中的迷茫與堅強；薛濤書寫男孩成長的《樺皮船》，展現了男孩在獨特經歷中的蛻變。同時，隨著社會對生態保護的重視，生態主題的兒童文學作品也逐漸增多，如鄧西的《秘境回聲》，講述了海南島熱帶雨林裏人與動物的故事，喚起孩子們對大自然的熱愛與保護意識。

在創作隊伍與手法上，當代兒童文學呈現出擴容與創新的趨勢。傳統兒童文學作家持續深耕，不斷推出佳作。與此同時，『跨界寫作』為兒童文學注入新活力。許多對生活有獨特經歷的文學名家加入創作行列，如楊志軍憑藉在青藏高原的生活經歷，創作了《巴顏喀拉山的孩子》《三江源的紮西德勒》；裘山山的《雪山上的達娃》也源於其在高原的生活感悟。他們帶來了不同的寫作風格與視角，豐富了兒童文學的表現形式。此外，對於一些具有科普、人文社科性質的題材，出版社傾向於邀請相關領域專家創作，像古生物學家苗德歲創作的《地球史詩：46 億年有多遠》，以專業知識為基礎，用生動有趣的方式為孩子們打開科學知識的大門。在表現手法上，現實主義精神凸顯，紀實性增強，使作品更貼近生活本真。

值得一提的是，繪本這一藝術形式在當代中國兒童文學領域發展迅猛。儘管原創繪本起步相對較晚，但藝術水準快速提升。如《別讓太陽掉下來》（郭振媛文、朱成梁繪）、《迷路的小孩》（金波文、鬱蓉繪）等作品，圖文並茂，將歡快童趣與深刻哲思巧妙融合。並且，許多厚重主題的出版作品採用繪本形式，產生了以小見大的良好效果，如『童心向黨·百年輝煌』系列繪本，以簡潔生動的畫面再現了中國共產黨的百年奮鬥歷程。

然而，當代中國兒童文學創作在繁榮發展的背後，也面臨一些挑戰。部分作品存在同質化現象，在主題表達、情節設置等方面缺乏創新，難以吸引小讀者的目光。此外，在全球化背景下，如何創作出既具有中國特色，又能被世界各國孩子喜愛的作品，實現更有效的國際傳播，也是創作者們需要思考的問題。

王祖友：《行走的學校》對兒童文學創作有哪些可能的啟發意義？

鄒雷：好的，我將從文學成就、兒童文學地位和創作啟發三個方面，來回答《行走的學校》的價值。

一方面是文學成就與影響力：

首先是得到了權威獎項與業界認可。《行走的學校》自出版以來獲得了多項重要文學獎項，充分體現了其在文學藝術上的高度成就。作品榮獲江蘇省第八屆紫金山文學獎兒童文學獎，該獎項是江蘇省最具權威

的文學大獎，被譽為『江蘇的魯迅文學獎和茅盾文學獎』。同時，該書還獲得了山西出版集團頒發的原創出版獎和年度優秀版權輸出獎，入選第 31 屆全國圖書交易博覽會少兒閱讀節『百種優秀童書』。這些獎項不僅彰顯了作品的藝術價值，也體現了出版界與文學界對作品主題深度和藝術創新的高度肯定。

其次是版權輸出與國際影響。《行走的學校》實現了成功的國際傳播，其版權已輸出至『一帶一路』國家阿聯酋，成為中國兒童文學『走出去』的代表作之一。這一成就表明作品所傳達的精神價值具有超越國界的普遍意義，能夠跨越文化差異，在國際上引發共鳴。作品在阿聯酋的出版不僅擴大了中國兒童文學的國際影響力，也為『一帶一路』文化交流做出了貢獻。

三是評論界高度評價。《行走的學校》受到了教育界、文學界權威人士的一致推崇。中國政協常委、中國陶行知研究會會長朱永新評價該書：『作品書寫了特殊時期兒童的生存命運和精神成長，讓童年生命真正參與到重大主題的思索之中，很好地完成了主題創作宏大敘事的兒童化書寫』。中國兒童文學研究會副會長徐德霞則指出：『《行走的學校》是在重大題材上的新開拓。作品內容重而不沉，輕而不飄，趣而不俗，在重大歷史題材創作中別開生面』。《光明日報》副主編譚華、兒童文學評論家崔昕平等專家也紛紛撰文讚揚作品『將「家國」植根於少年心間』的獨特藝術成就。

四是傳播廣度與深度。作品獲得了主流媒體的廣泛關注和報導，《光明日報》《文藝報》《中國新聞出版廣電報》等權威媒體刊發了多位專家的評論文章，《人民網》《光明網》《學習強國》等平臺相繼轉載。同時，作品還入選了『2022 年度兒童文學新書榜特別推薦作品』『中國童書榜 2022 年度百佳書單』等重要榜單，進一步擴大了其社會影響力。這些廣泛而深入的傳播表明作品在專業領域和大眾讀者中都獲得了高度認可。

第二個方面講講在兒童文學中的開創性地位。首先是題材處理的突破性貢獻。《行走的學校》在兒童文學領域實現了重大歷史題材創作的突破。作品以宏大的抗日戰爭至解放戰爭歷史背景與微小個體敘事的創造性結合，開闢了兒童文學書寫重大歷史事件的新路徑。傳統上，革命歷史題材在兒童文學中往往陷入概念化、教條化的窠臼，而我則通過兒童視角的自覺堅守，將宏大的家國敘事轉化為孩子們可感可知的生活經歷和情感體驗。作品聚焦 1935 年新安旅行團成立至 1952 年結束活動的 17 年曆史，通過這群少年『以文藝為武器』宣傳抗日的特殊經歷，將童年生命真正融入重大主題的創作方式，打破了兒童文學與成人文學在題材處理上的界限，證明了兒童文學同樣能夠承載深刻的歷史內容和思想價值。

其次是教育理念的文學實踐。《行走的學校》是陶行知『生活即教育，社會即學校』教育思想的生動文學實踐。作品通過新安旅行團這一特殊教育實踐，展示了教育如何超越課堂邊界，在社會實踐中實現『教、學、做合一』的理想境界。書中的小團員們實行『小先生制』和民主生活會，自我教育、自我管理，在沒有固定校舍和專業教師的情況下，通過旅行、宣傳、勞動等實踐活動獲得了全面的成長。這種教育理念的文學化呈現，為當代教育提供了深刻啟示。真正的教育不僅是知識的傳授，更是人格的塑造和社會責任感的培養。

第三是人物塑造與集體記憶的建構。《行走的學校》成功塑造了一群鮮活立體的少年形象，如意志堅定的劉紀宇、聰明淘氣的音樂少年章棗、在苦難中成長的丁捷、繪畫天才童牧等。這些人物既具有鮮明的個體特徵，又共同構成了一個富有生命力的集體形象。我沒有將他們塑造成高大全的英雄，而是真實呈現了他們的天真、淘氣以及在困境中的掙扎與成長，使這些歷史人物成為當代兒童可以理解和認同的藝術形象。新安旅行團的歷史曾長期被主流歷史敘事所忽視，直到 2021 年習近平總書記給新安小學少先隊員們回信，這段歷史才重新進入公眾視野。《行走的學校》以文學形式保存和傳播了這一珍貴的歷史記憶，為當代少年兒童提供了連接歷史的橋樑。

第三個方面是對兒童文學創作的啟發意義。首先是歷史敘事的兒童化表達範式。《行走的學校》提供了一種將宏大歷史轉化為兒童可感可知經驗的有效模式。作品通過以下創新手法實現了歷史敘事的兒童化：首先是微觀視角切入。以 14 名孩子的修學之旅折射抗戰大歷史，將國家命運具象化為個人成長軌跡。

在日常化敘事策略上,用『苦中作樂』的細節消解歷史的沉重感,避免過度悲情化。作遊戲精神的融入,將宣傳抗日的過程轉化為創作歌舞、辦報、放電影等藝術活動,契合兒童心理特徵。搞好歷史真實與文學想像的平衡,在尊重史實基礎上加入合理虛構,使事件情節化、故事化,運用矛盾、衝突、巧合等手法增強可讀性,將抽象的歷史轉化為具體的生命體驗。

其次是成長書寫的多維拓展。《行走的學校》對兒童文學中的成長主題進行了重要拓展,創造了三重成長維度的交織:其一是個體成長。通過丁捷從怯懦到勇敢、章棗從調皮到有擔當等人物弧光,展現個體性格發展。其二是集體成長。表現 14 人團體如何發展為 600 餘人的革命力量,形成『集體主義精神』的有機體。其三是歷史性成長,將個人成長融入民族救亡的歷史進程,體現『個人命運與國家前途緊密相連』的崇高境界。這種多維成長敘事打破了傳統成長小說聚焦個體心理發展的局限,豐富了兒童文學成長書寫的內涵和深度。

第三是教育理念的敘事轉化。《行走的學校》為如何在兒童文學中藝術化呈現教育思想提供了成功範例。作品沒有進行抽象的理論說教,而是通過生動的故事展現陶行知教育理念的實踐效果。其一是『小先生制』的實踐,孩子們互相教學,實現了『教、學、做合一』。其二是社會即課堂的展示,在旅行中學習地理、歷史、社會知識,在宣傳活動中培養藝術才能和組織能力。其三是民主教育的體現,汪校長遇事先問『你們說怎麼辦?』,培養獨立思考能力,這些教育理念的情節化呈現,使作品超越了簡單的故事講述,成為一部關於教育本質的深刻寓言。

第四是現實主義的美學突破。《行走的學校》在兒童文學現實主義創作方法上實現了重要突破。其一是紀實與虛構的創造性融合,在尊重歷史事實基礎上,運用文學想像復活歷史場景,使歷史人物成為鮮活的文學形象。其二是兒童本位的堅守,避免主題先行,始終以兒童視角觀察和呈現歷史,保持童真童趣。其三是苦難敘事的昇華,不回避『缺衣少食、居無定所』的困境,但突出『逆境中的強韌、艱難中的樂觀』,用精神富足超越物質貧困。其四是情感深度的開掘,通過『一個接一個生動好玩的小故事』傳遞深厚情感,既有『苦中作樂的喜點』,也有『令人回味的感人淚點』。這種既真實又充滿詩意的現實主義,為兒童文學如何處理嚴肅主題提供了美學典範。

第五是精神價值的當代傳承。《行走的學校》通過歷史與當下的精神對話,為新時代兒童文學如何傳承紅色基因提供了重要啟示。比如說,家國情懷的當代表達,將歷史中的愛國精神轉化為當代青少年可理解的『責任擔當』;苦難教育的藝術轉化,通過歷史中的物質貧困反襯當代精神貧乏,喚醒感恩與進取意識;集體價值的重新發現,在個人主義盛行的時代,重新彰顯『團結互助的集體主義精神』;實踐精神的弘揚,針對當代教育脫離實際的弊端,宣導『知行合一』的行動哲學。

《行走的學校》對兒童文學創作的核心啟示在於:真正優秀的兒童文學應當具備歷史厚度、思想深度和藝術高度的統一;它既能夠紮根於民族歷史的土壤,又能夠超越具體時空限制,與不同時代的兒童進行精神對話;它既是兒童的,也是全人類的;既是文學的,也是教育的。正如朱永新所言:『每一本優秀的童書,都是一個種子,它播到孩子們的心裏,就會發芽、生根、生長,會讓他們成為卓越和優秀的人』。《行走的學校》正是這樣一顆充滿生命力的種子,它的文學價值和啟示意義,將隨著時間推移而愈發彰顯。

#### 參考文獻

① 鄒雷:《行走的學校》,太原:希望出版社,2022 年版。